苍茫松潘

■龙小龙

山河赋

长征地标巡礼

盛夏，我从四川乐山出发，开车直奔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北部的松潘高原。车程近9个小时，终于到达目的地。呈现在眼前的，是一片草甸密布、连绵渺远的景象，干净的天空，空旷高远，飞鸟在空中翱翔……

红军过草地纪念碑（无人机拍摄）。 王 曦摄

一

位于川西北的松潘草地，是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连接地段，纵横300公里，面积有1.52万平方公里。曾经，草地有大片的沼泽，盘根错节的水草覆盖于沼泽之上，稍不留神，人就会陷入其中，难以自拔。

“雪皑皑，野茫茫，高原寒，炊断粮。”我曾读到萧华将军的《长征组歌》，只觉得句子铿锵，诗意悲怆。现在亲赴松潘草地，置身于苍茫原野，我才深深感受到诗句背后的千钧重量。

提到“草地”二字，世人难免联想到芳草萋萋、风光旖旎的旷野。“延安五老”之一的董必武曾回忆：“我们初听到草地这个名字，以为不过是人烟很少、草木浓密的地方。谁知草地是真草地，在地上看不见泥土，只看见草和水……简直没有人迹，所以也没有路，没有树木。”上世纪80年代，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慕名踏上这片神秘的草地时，也不由得惊呼：“夏日里，一望无际的草地是一幅鲜花织成的魔毯。”然而，正是这迷人的魔毯，吞噬了无数红军官兵，使这里成为长征中非战斗减员最多的地方。

当地人讲解说：当年，草甸看起来是平整柔软的，就像一匹浩大的绿色绒毯铺向天边，实则是暗藏深渊。经年累月的积水浸泡着又厚又密的草根，表层草皮脆弱，下面是深不见底的黑色泥潭。稍不留意，就可能陷入沼泽而身亡。

朝晴暮雨、一日四季，是这里的常态。晴空转瞬就乌云密布，狂风卷着冰雪抽打荒原，天地一片混沌。亘古的苍茫与死寂，构筑成一道隔绝生机的天然屏障。千百年来，这片草地以极致的荒芜和神秘，拒绝人们的靠近。

直到1935年的盛夏，一支筚路蓝缕却心怀家国的军队，踏入这片茫茫草地。自此，苍茫的松潘草地不再只是寂寥荒芜的高原秘境，而是成为孕育不朽精神的红色沃土。

二

1935年6月，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懋功会师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，制定了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。6月29日，中革军委制定《松潘战役计划》，决心集中两大红军主力，乘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初到松潘、立足未稳、碉堡构筑尚未完成之机，坚决迅速地攻占松潘，消灭胡宗南部，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。

两河口会议后，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北上，先后翻越多座大雪山，先头部队于7月16日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盖。

然而，红一方面军出发后，张国焘始终按兵不动。直到7月19日中革军委下达《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》，重新进行兵力部署，命令各部队于7月28日前在松潘外围完成集结，张国焘这才开始调兵北上。

可是，此时敌情已经发生了不利于红军的变化。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，并基本完成堡垒线的构筑，控制了由松潘北去的大道；薛岳部和川军也从东南方向压来。红军进攻松潘的先机已经丧失。10多万红军集中在人烟稀少、粮食奇缺的少数民族地区，处境非常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革军委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，决定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。

这是战略取舍，也是绝境求生的壮烈抉择。唯有以血肉之躯涉过死亡之境，才能开辟一条生路。

8月21日早晨，红1军团第2师4团作为先头部队，穿过一条无名山谷后，率先踏入了松潘草地。站在草地边缘，团政治委员杨成武极目远眺：野草丛生，水流交错，雾气缭绕。置身其中，极难辨别方向。没有树木做路标，没有石头做参照，几乎没有一块干燥坚硬的地面，只有沼泽上一丛丛几尺高的乱草，黑色的积水散发着腐臭，草丛下是无法预测的泥潭。部队进入草地后，经常雨雾弥漫，连向导都难以辨清道路，有时艰难行进几小时后，却发觉又回到了原地。

草地河沟纵横，积水冰冷刺骨，几乎每过一条河，都有身体虚弱的战士倒下。更可怕的是隐藏在水草下的沼泽，稍有不慎，人和马都会陷下去。一位老红军曾回忆：“草地上有不少绿草覆盖的泥沼，都是陷人坑，人和牲口掉到里面，越陷越深，直至被吞没。一个人陷进去后，援救者用力过猛也会被带入深泥之中。”

到了晚上，身心俱疲的红军官兵只能在泥泞潮湿的草甸上露宿。草地气候变化无常，昼夜温差极大。虽然是夏季，但草地夜间的气温不到10摄氏度。红军官兵以地为床，以天为帐，在风雨寒霜中熬过漫漫长夜，用体温相互取暖，用信念彼此鼓励。许多战士在睡梦中再也没有醒来。

粮食困难直接威胁着红军官兵的生命。过草地前，为了筹集粮食过草地，中央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任主任的筹粮委员会，想方设法筹集粮食。但川西北高原人烟稀少、物产匮乏，无法满足数万大军的粮食所需。行程未半，已经断炊。首长们忍痛杀掉自己的坐骑，以供战士们果腹，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，无法根本解决缺粮问题。野菜、草根就成了大家的主要食物。

于是，朱德发出了“尝百草”的号召，成立野菜委员会。没有任何化验仪器，大家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去尝。后来，在朱德的指导下，野菜委员会编写了《吃野菜须知》下发到各连队。

前面的部队还可以挖野菜充饥，后卫部队连野菜也无处可挖。实在没有可吃的了，就煮皮带、马鞍充饥……

寒冷、饥饿、疲劳，使许多官兵长眠于草地。

红1军团第2师4团党支部的青年委员郑金煜，是一个作战勇敢、工作积极的“红小鬼”。他行军走在前头，柴火拣重的背，还抽空做宣传工作。他一路上小心翼翼地把火柴藏在贴身处，使大家在寒冷的夜晚可以点燃篝火取暖，这给团政治委员杨成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可是，饥饿和寒冷使郑金煜很快病倒。发着高烧坚持行军的他，渐渐掉队了。杨成武知道后，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，但他身体太虚弱了，根本坐不住，卫生员就把他绑在马背上。草地行军的第4天，郑金煜断断续续地对杨成武说：“我不行了，感谢你对我的照顾。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，革命一定会胜利……我确实不行了，我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了。”杨成武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旁边的战士也泣不成声。就在走出草地的前一天，17岁的郑金煜永远闭上了双眼。后来，作家王愿坚根据他的事迹，创作了短篇小说《七根火柴》。

红3军团有个连队，先后牺牲了9名炊事员。长征途中的炊事员非常辛苦，行军时要肩挑背扛必需的炊具，到了宿营地要安灶、生火、煮饭、烧水。因此，每天休息的时间比一般战士少很多。过草地时严重缺粮，他们想方设法寻找能吃的东西给战士们充饥，自己却忍着饥饿坚持行军。为了减轻负重，连长劝他们舍弃那口大铜锅，但他们说什么也不同意，坚持背着行军，以便战士们在宿营时能吃口热食、喝口热水。当部队终于到达陕北时，这个连从江西出发的9名炊事员已全部牺牲。而这个连的战士，除了战斗牺牲外，没有一人因饥饿而减员。

在松潘县的红军长征纪念馆里，收藏着一块长约90厘米、宽约20厘米、厚约2厘米的木板。这是红军给藏族同胞留下的“割麦证”，大致内容是：我们割了200斤青稞，这块木牌可作为购买这些青稞的凭证，你们归来以后拿这块木牌，可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兑取银子等。

1935年7月，红军到达松潘县毛儿盖镇克藏村，部队粮草供应异常困难。当地藏族群众不知红军是人民军队，很多人都躲进山里。面对找不到主人的青稞地，红军只好自己动手收割庄稼充饥。没法当面致谢赔付，他们便找来木板，一笔一画写下借据，郑重留下承诺。红军把“割麦证”留在田间，匆匆踏上了征途。后来，当地藏民发现了“割麦证”，并妥善保存下来。

在绝境中不改本色，在危难中坚守底线。纪律严明是一种融入意识、刻入骨髓的基因，也是人民军队生生不息的根本保证。

令人动容的红色故事还有很多。侧耳倾听，每一棵小草，每一寸泥土，仿佛都在低声地讲述。凝眸仰望，那些故事如暗夜中的星光，穿透层层阴霾，照亮漫漫前路。

三

班佑河畔，有一座赭红色的大理石纪念碑。这是为了纪念数百名红军烈士而建的。1935年8月下旬，红3军第11团过了班佑河。走出草地后，彭德怀命令团政治委员王平，带一个营返回去接应尚未过河的七八百人。王平带着战士们走到班佑河边时，隔河看见这些战士背靠背坐着。他大声呼喊，却没人回应，便涉水过河去接应。走到跟前才发现，这些战士都已经停止了呼吸。数百名疲惫至极的战士，熬过了风雪泥潭，扛住了饥寒交迫，却在即将看见人烟的河滩上，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，坐下休息后再也没能站起来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在1935年、1936年的草地行军中，有1万多名红军官兵长眠于此。

穿越草地，长征的每一步，都是用生命和鲜血铺就的。

在松潘县川主寺镇元宝山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巍然矗立，像一位沉默的老者，静静守望着这片吞噬了无数生命的草地。

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，这支英雄的革命队伍，怀揣坚定的信念，以无畏的勇气直面生死，用顽强的意志挑战极限，淬炼出历久弥新、永续传承的长征精神，谱写了荡气回肠、可歌可泣的革命壮歌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。

苍茫松潘，草甸铸魂。先烈们的英魂已化作遍地芳草，化作了不灭的星光，永远闪耀在历史的天空，烙在民族的记忆里。

如今的松潘草地，已从当年吞噬生命的“死亡陷阱”，蜕变为若尔盖国家公园的核心组成部分，成为黄河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与“红色草原”。金雕、黑颈鹤、藏羚羊等珍稀物种重返栖息地，牧草丰茂、牛羊成群，生态价值与红色记忆在此交融共生。红军过草地的精神，正以沉浸式的方式深植人心。松潘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，成为真实生动的红色课堂。

返程途中，我回望松潘，苍茫的草甸渐行渐远，而我们脚下的路平坦宽阔。

本版学术支持：褚 银
版式设计：周永昊

扫码观看视频《过雪山草地》

红色足迹

源头村后的葫芦窖

■韩 莹

武夷山余脉层峦叠嶂，在地图上看，形如一个个出头的檩条。其中一条延伸到了赣南北部，芦峰岭就隐在其中。

芦峰岭海拔885米，山高险峻，林深树密，如一道天然屏障，将江西宁都、永丰两县分隔开来。南部半山腰有个源头村，像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闪耀在红色历史的天空。

这里是赣江支流梅江的源头之一。汩汩清流撞石穿林，从芦峰岭尖顺流而下。宁都县小布镇的源头村，是潺潺流水滋养的第一座村落。

这里是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设伏要地。村子四周群山环绕，中间开阔平缓，整片地形像一只口袋。山中的青石古驿道，恰似红军给敌人准备的绞索，只要把敌人引诱进来，便能迅速收紧形成合围，使敌人成为笼中之鸟，插翅难飞。

1930年10月，国民党纠集10万兵力，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军事“围剿”，妄图围歼成立不久的红一方面军。至12月下旬，各路敌军已深入到中央苏区腹地，大战一触即发。

战前，毛泽东同志曾悄悄来到源头村，察地形、布阵局。这座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，距当时红军总部驻地小布仅二三十里，若能完成坚壁清野，被诱至此处的敌军便会陷入困境，不打自垮。

村干部挨家挨户动员，红军排长带着战士们搭手帮工，全村劳力悉数上阵。几天工夫，村后十三星坡上便挖出了十几口“葫芦窖”。这里居高临下，林密坡陡、视野开阔，既能俯瞰全村动静，又便于隐蔽设伏。一个个葫芦窖口小、腹大而深，每个窖都像一个小房间。乡亲们把所有粮食、炊具、餐具等尽数搬进窖中，在窖口覆上树枝草皮，看上去与山包浑然一体，还在窖子一旁设计了通风口，使藏进窖里的物资久放不坏。

1930年12月25日，谭道源率近万名国民党军来到源头村，看到的却是一座空空如也的村庄。曾在谭道源部任上士文书的罗文浪后来回忆：“我们驻在源头时，大米运不来，掳掠些稻谷，但找不到推砻和舂具，磨子也不全……其次是找不到一个壮年男子，行军时因为没有好的向导，时常走错了路，在荒僻的山中上不得，下不得。”

乡亲们在哪里？他们白天隐蔽在密林深处观察敌情，入夜便配合游击队袭扰敌军。他们把点燃的线香绑在敌军驻地四周的树枝上，风摇枝动、星火闪烁，恰似伏兵密布，再加上零星枪弹、洋油箱里炸响的鞭炮，虚虚实实、真假难辨。谭道源部官兵夜夜惊惶、疲惫不堪。

大战之前是寂静。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在《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》中写道：“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，毛委员让我们检查一下东西，准备从源头撤回到小布，这是第二次离开源头了。前两天，我们曾来到源头，摆好了阵势，但没有打，毛委员就把部队撤回去了。今天一大早，我们又来了，还是不战往回走。一路上，我闷闷地走着，怎么也想不通，实在憋不住了，就急走了几步，赶到毛委员身边，拉了拉毛委员的衣角说：‘毛委员，敌人就在鼻子底下，为什么我们不打又往回撤啊？’毛委员一听我这问话，就明白了。他边走边对我说：‘小鬼，我们在源头地区布置了一个大口袋，诱惑敌人来钻。可是敌人始终不脱离所处优势位置，如果我们硬打，伤亡代价就大……’”

诱敌的耐心，换来了决胜的战机。两天后，龙冈战斗打响，红军歼敌18师师部和2个旅近1万人，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，胜利空前。本就心慌的谭道源联系不上张辉瓒部，慌忙率部向东韶逃窜。1931年1月2日，红军决定乘胜追击，下达追歼谭道源部的命令。最终，红军在东韶歼敌1个多旅，俘敌3000余人，缴获长短枪2000余支、机关枪40余挺、迫击炮4门，子弹13万发，电台1部，取得东韶大捷。这时，其他各路敌人由于惧怕，纷纷退出苏区。于是，蒋介石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“围剿”彻底失败。

近百年岁月走过，山间林木愈发葱郁。循着村民的指引，我登上源头村屋后的十三星坡，14口葫芦窖如梅花瓣般散落，历经风雨的窖壁依旧光滑结实。村里的老人说，当年修窖时，乡亲们用硬木板反复捶打窖壁，夯得密不透风，草籽落不住，草根扎不进，才让这些地窖完好留存至今。一代又一代源头村村民悉心守护着它们，就像当年的村民守护红军、守护着胜利的希望。

清澈的源头水，一路奔流向前。这片深沉的红土地上，如今已是茶山连绵。浓酽的绿意里，是蒸蒸日上的生活，是接续奋斗的脚步。

下图：源头村屋后的葫芦窖。

作者提供